



尽管88岁了,可罗运仙包的粽子个个模样精致

梅亚军 摄

在高石坎林场,罗运仙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棵树。不是杉树,不是枫树,也不是松树。时间正在抽干往昔,她越活越像极了一棵垂柳,垂头,再垂头,弯腰,再弯腰,直到弯曲至根部,低到泥土的高度。身体弯曲而谦卑,那是在叩拜自然,叩拜阳光,叩拜土地。

每年,冬天都喜欢在中国黔东南大地上这个叫木黄镇的山沟里来回游荡,深山里的人早习以为常,他们原谅冬木板着一张严峻面孔,用寒冷的神色逼退这里的热情和活力。低矮昏暗的木房子,罗运仙坐在土灶前烤火。灶前,一堆秸秆已经燃过了,剩下明明灭灭的灰烬,罗运仙只愿攫取这一点余温。为什么不去树林里弄些柴块来烧火呢?火势强劲,热力充足,剩下的火炭也会明亮持久一些,但似乎她已经很满意。看上去,罗运仙的面目已经老得和四周的木板壁一样,长年累月经受劳苦、贫寒、孤寂、烟熏火燎,才这般陈旧灰暗。她像极了我去世的外婆,她们似乎有着相似的孤独,相似的别离、相似的沉默和厚道,拥有人在世时留在时间之上的倒影。这是高石坎护林人所呈现的生活姿势和生命态度,也是中国大部分农民的面孔和形态,让人看了,觉得亲切又心疼。

尽管已80多岁了,罗运仙依旧坐坐端端正,衣着得体。她搁在双膝上的手掌,蝴蝶一样长着醒目的老年斑,这样的黑斑呈现时间冷酷的美。我于是坚信,只有老人才有将记忆皱褶展开的力量,才能在时光的隧道里找到微弱亮光,直到找到所有事情的起点。

起点就是高石坎林场这个圆心,罗运仙一生的年轻都围绕着她旋转。现在,只要她稍微扬高下巴,眯缝眼睛,瞄准时间的某一根细线,就能轻易找到1976年的光景。那番光景是以建厂公社(上世纪70年代的行政辖区,后为木黄镇)为底板的。在公社里,土地、资产甚至青春都是集体化的,所有生产活动必须无条件捆绑成一股绳,整齐划一,大步前进,人们的活力被框定在公社、生产队这些大大小小的盒子里。不管任何年代,年轻始终是炫目的,集体化的盒子遮不住青春的力量和光芒。在建厂公社的猪场里,罗运仙成天提着一个木水桶,两条粗黑的麻花辫在胸前背后利落地甩荡,将时光甩得清脆亮丽。猪场密实的臭味被罗运仙的身影撞得四散。一听到桶响,猪儿就翘着鼻子哼哼唧唧地朝她这边拱过来。急催不得这些肥猪,它们是集体的。就这样,罗运仙拿着粮票去公社打粮食的脚步就特别勤快,人无吃的可以,猪的粮食一粒不能少。猪儿们吃得多,耗粮大,公社就有人想到一个好主意,说是不如让饲养员把它们赶到高石坎林场,在那里一边护林一边

像树木一样生长和老去

陈丹玲

罗运仙,197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赶着公社的28头猪攀上高石坎林场,开始了长达40年的巡山。至今,88岁的老人仍然生活在山上,以微弱的体力守护着山林,守护着一份融入生命的责任……

种苞谷红苕,用来喂集体的猪儿。

1977年春天,罗运仙赶着28头猪去了高石坎。去往高石坎的山路狭窄,海拔要比当时的建厂公社高出许多。七岭八弯,遍野苍茫,猪儿们懒懒散散地走动,笨头笨脑地寻觅,罗运仙一路唤着它们向前走。溜溜溜……溜溜溜……声音回荡,偶尔会有一丝焦急的情绪杂杂在里面。弯曲的山路上,队伍浩荡。

“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土地承包到户,建厂公社的集体被拆散,修建房舍、新造家具、生活燃料等等结实奋进的生活对木材的需求分秒不离。无疑,高石坎成为方圆数十里村民的冲刺目标。三五成群,单兵作战,随着私欲的膨胀,树木轰然倒地,人们手里的利斧在烈日和月光下闪烁寒光……

火热的生活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很多人出走的方向。同样,高石坎林场苍茫广阔,在这里面,除了那些蠢蠢欲动的砍树谋利让人防不胜防,就只剩那性乖戾的风在林间逡巡,在四季闯荡。林场里很多人都离开了,投入生活火热的怀抱,只有罗运仙和少数几个留了下来,留在树木们的身边,留在那些灌满寂寞时光的弯曲山路上。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片森林,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融入它的神秘和诗意里。草木生长,虫兽出没,自然择优而生,一切生物遵守天地规则,这里拥有严密的生存秩序和强大的生命磁场。一片花瓣可以成为婚床。一棵松木对季节永远忠诚。一队蚂蚁听见了进攻的号令。一只松鼠独自徘徊

小小的狡黠。一头野猪带着几只娃崽大摇大摆。一条蛇在水沟旁照见镶着鳞片的脸……诗意是明朗的,危险也是显露的。森林像极了一个巨大的教场,生的路径,死的归宿,在这里清晰,又在这里模糊。人,出没于森林,来自生命源头的自然属性亦如山风溪流,轻轻呼唤人的心灵皈依。亲近自然,亲近万物,就像当初在伊甸园里,大家从同一个季节开始萌发,神将所有的困难、不幸、快乐及幸福都均匀地、公平地分摊给每一个人、每一只动物、每一双翅膀和每一片树叶。

后来的许多年,罗运仙就在高石坎林场里,心灵和性情都被森林的强大和深邃所涵盖和消融。每天,她都要去巡山,风雨无阻。踏过灌木,一些细小的道路被走成无限,迷宫一样在森林里布局,只有她能找到出口和入口。大地的谜面太多,预言和真相都藏在里面。正如在罗运仙的眼里,山岭的轮廓是弯曲的,藤条是弯曲的,溪流是弯曲的,天穹是弯曲的,野兔背部的漩涡也是弯曲的,仿佛能兜住来自远古的晨昏和霞光。她在森林赐予的生活和岁月里边穿行,让无数的树、无数的叶、无数的草、无数的花把她娇小的身躯包围起来,这倒



罗运仙与其他护林员巡山中小憩 田林 摄

也平添了一些乐趣。只是很多个月夜,她在巡山,对于高石坎林场而言,她觉得月亮弯曲得很没有道理,整个儿树林照样叮当作响,就像谁把月亮取下来,打成银饰佩戴在了身上,一路响叮当。

当然,这是一些美好的时辰,美好的寂静,容易让罗运仙记住和怀念。

不过,巡山的时候,和另一个女人狠狠地打了一架就令她刻骨铭心,是那种无法理解和消化的刻骨铭心。至今说起,她的语气里依旧有当初遏制不住的愤然,声音高亢,还有内心的鄙弃。和罗运仙打架的是山下寨子中的一个女人。砍伐树木,那个女人居然一点儿都不鬼祟,不畏怯。理由很简单,天是大家的,地是大家的,高石坎林场不是你罗运仙一个人的,是政府的,政府是百姓的天地,也是大家的,那自然林场里的树木也有她的一份,修房造屋,烧火煮饭,她当然是要砍伐的。这逻辑把罗运仙给绕了进去,无理得比她走过的毛坡路还要复杂乱套。和不讲理的人说话肯定不投机,看着树木倒地、枝条折断,气不打一处来,罗运仙坚决要扣下那个女人的镰刀。对方不服气得狠,她们扭打成团。灌木丛被滚出两大块塌陷的印痕,不细看,还以为是大个的牲畜在这里激战和争夺。庄严和狼狈被撕扯成碎片,在两人的面目上纠缠、零落。突然,她们同时想到了比此刻的情绪更加锋利和冷酷的镰刀,还夹在两副肉身之间,这不止伤害草木,血色的猩红永远比绿色的汁液要狰狞,要腥臭。权衡利弊思量一番之后,大家松开手指,放弃镰刀。那个女人指天指地地咒骂,愤然离开护林林。

索取之物不但不得,反倒丢了工具和脸蛋,情绪的灰烬里重新闪现火花。半夜里,山下的女人摸到林场,在木房子背后找到罗运仙的房间。撕破我的面子,也让你不得遮盖。斧头一阵狂砸,后窗成为那个夜晚最痛楚、最无奈、最伤情的入口。罗运仙惊醒过后,独自坐在床沿,不想言语。

1934年是离得最近的一段历史切片,中国黔东南大地一带的山水森林在历史的舞台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布景。翻开史料,就能清晰地看见1934年

9月28日这一天。远远近近的战火正在逼近或者拉响,军长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以黔东木黄小镇的奇特地势和丛林为掩护,死生阔别,血的代价换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的顺利会师。“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我跑,敌少我捣。”从这番周旋掩蔽,闪躲进攻的意味中,无数战斗的场面都可以抵达人们想象的边际,同样也能让人察觉到这一带森林给予人类的接纳和庇护。每每听父辈讲起这些史事,罗运仙就会在心里假设,若没有森林,没有遮挡,那么所有争斗是不是更加赤裸和决绝?战争、饥饿、贫苦,以及人类内心的种种恐惧,最后都由森林来进行抚慰。至于爱丽丝的兔子洞、美猴王的花果山、七个矮人的木床,以及农夫遇见的蛇,等等,这些童话、传说、寓言无不是从一片森林开始生发。若你留意高石坎林场里三三两两的坟冢,留意坟茔旁草木的生长与溃腐,就很难否定森林是通往人类精神内里的场院,如草木生长般,它让爱恨、生死、离合的树影重叠在人的心灵上,此生彼息,消融弥合。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对自然的迷恋、依赖、对照终究是人类不能消除的胎记,是预言,也是上苍余音袅袅的呼唤。多想屋后有树林,院前有小溪,左右各有菜园,这些,几乎成为人类家园意识的具体物象。

在几十年的护林岁月里,感应天地秩序和四季轮回,罗运仙仿佛能听见每一个自然生命的吟唱,听见上苍留在所有生命里的余音袅袅。长期以来,她说不出这种聆听的奇妙,但她尊崇来自草木生命磁场的吸附,像被授命了一样,干着诸如种树、捡柴、披荆斩棘之类的活儿。前些年,她和另外几个护林员需要去山下的木黄镇背树苗上山。大多是杉树苗。钉子不小也不大,往街上一走,很难遇到什么稀奇事儿,容易遇到的倒是一些不认识的熟练。久居林场,别人过街时背兜里常是日用品,或者是一些走亲戚的酒水礼品,惟独罗运仙等人背的是一捆一捆的枝梗,走过时,带着尖刺,也带着树枝上的母土。行人见了,仿佛遇着怪物一般,老远就躲开了,还露出厌弃的表情。罗运仙从来不厌弃每一棵棵树苗,尤其认为杉树是木材中守规则、讲分寸、有刚正的一种。杉树主干笔直,象征着正直、光明、磊落的个性。分散出去的枝梗错落有序,针型叶片在阳光下——排开利剑,紧紧围绕主干这一套坚不可摧的良好骨架,一根枝与另一根枝之间也会相互谦让有礼,但又绝不畏怯强敌,凡有侵犯,剑锋统一向外,这多像一个家族,或者更像一个民族的生存之道。往往,哲理被一些朴素的沉默的草木所明示,人的灵性体现在某一瞬间的顿悟里。

罗运仙当然是十分喜欢这些杉树苗的,它们令她想起自己孩子的那些童稚言行,内心甜美起来。她把这种甜美和树苗们一起栽种在高石坎林场。某一坡岭上,立春之后的山风依旧低沉,它们拖着疲惫的身子扫过灌木丛,也扫过罗运仙弓着的腰背。树坑要深挖,尺度要掌握,最好在新泥与老土相结的地方就停顿,既能保持根须的稳固,也能保证水分的充足。之前,她以母亲的名义把每一棵棵树苗生长的环节都进行了预设和准备。挖树坑,施底肥,扶树身,掩虚土,压紧,一套重复的劳动程序,在无数的日子和汗水里耐心行进。我们能想象,一个女人手里的锄头也许是粗糙的,也许比我们想到的又要轻巧一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取自白银的精华,又被铁匠的重锤反复锻击,它暗藏的锋利和手臂的力量达成默契,在高石坎林场中,在中国绝大部分的乡土上,一起调配着安静、和谐的耕种生活。

事实上,如今在中国版图的任何地方,我们已经隐隐感知了某种觉醒的愿望。希望无数双布满裂口的、象征着艰辛的手,紧紧地握着锄把,将锋利对准生存的永恒图景——摒弃荒凉,构造青山、绿树、鸟鸣、溪流、云天、阳光的家园,使这一古朴的理想被种植和记录,被时间馈赠,得到慢慢滋养。因为在一些城市,我们与蓝天、绿树的相见已经越来越少。曾长期伴随我们的树木、飞鸟和野兽,它们飞翔、盘旋、俯冲、奔跑和嬉戏的形象太容易变成一张张钞票。(下接第6版)

绍和剖析。因为从那之后,特别是近年来,我曾经参加过许多次发展党员的支部大会,发现对新党员的介绍往往是概念化、公式化的,看不出这些活生生的人的鲜明个性,至于谈到新党员的缺点,则往往是用“有时”、“希望”等模棱两可的词语体现……惟其如此,我才更感谢当年我的人党介绍人对我的缺点的剖析,尽管那时在千人发展大会上,这种鞭辟入里的批评,曾经使我汗颜,使我难以入眠。因为我更晓得,为了更好地挑起党和人民交给的重担,自己必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地荡涤掉身上的灰尘,使步子迈得越来越坚定,越来越稳健。出席大会的全体师生员工,都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党员的行列中又增添了新鲜的血液。

12月9日夜晚,为了纪念“一二·九”革命学生运动30周年,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会前,中央领导同志还接见了部分学校三好学生的代表。我和西城区的实验中学、东城区的女二中、崇文区的汇文中学的三名中学生一起,也荣幸地参加了这次会见。人民大会堂高大、雄伟、壮观、肃穆,晚7时,镁光灯阵阵闪亮。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和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北京市委书记万里,以及一些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同志,一起来到我们中间。

彭真同志身材魁梧,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使我不由得想起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时曾经以拉黄包车为职业掩护的传闻。他略带山西口音,十分健谈,讲话时根本不用讲稿,也不拿提纲,激情洋溢,滔滔不绝,一句接一句,似乎没有什么停顿间歇,

闽西诗草

高洪波

松毛岭上

天空中有一万双眼睛,
地面上有十万棵青松。

七天七夜的枪炮声,
伴七天七夜的血战,
七天云走,
七天星散,
刺刀与傲骨,
成为这山的支撑
水的叮咛。

松毛岭啊,
你没有华山的险峻,
泰山的巍峨,
没有黄山的秀丽,
峨眉的奇雄,
可你比世上所有的名山
多了几分凝重!
连盘绕山尖的白云
都与众不同:
忽而如战马驰骋,
忽而像雄鹰击空!
八十多年前的历史回响
陪着云朵伴长风,
掠过我们的耳畔,
带来殷殷的叮咛:
谁忘记了浴血的松毛岭,
谁就担负背叛者的骂名!

烈日下我们祭拜先烈,
一万双眼睛
悬挂在高渺的天空……
(注:松毛岭战役,红军伤亡万余人,掩护中央政府撤退。)

致秋白先生

也许,集文豪与烈士于一身的
人只有你,秋白先生,
只有你,把党的领袖与文弱书生
合为一体的人,
也只有你,秋白先生。

三十六岁,三十六岁,
也许是数字的巧合。
在罗汉岭下,你
说了一句“此地甚好”,
黑白自辨,满脸从容。

子弹终止了你的生命,
文字却延续了它,
并且让你永生!
从此,大大小小的文人
来到这里,
只为了完成两个字:致敬。
或许还想去证两个字:真誠!

走过才溪乡

是财溪还是才溪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个认真的人
一家一户地走访,
一夜一夜地调研,
从合作社五角钱的股票
到红军家属的月薪,
柴米油盐价格表,
综合成一份调查报告。

八十年前的才溪乡,
因这份报告而出名。
六十多年前的才溪乡,
挣得了一座“光荣亭”。
三千子弟当红军,
该是一份多大的光荣!

重走长征路,
造访才溪乡。
一盏昏暗的马灯,
一张陈旧的木桌,
我读懂了中国革命,
我读懂了人民领袖毛泽东那深
邃的心灵……

(注:《才溪乡调查》为毛主席早年著作)

漩流中,小小的浪花

咏 慷

我是在北师大附中就读时入的党。那是1965年12月,我还是北师大附中一名高中生。北师大附中的校舍并不显眼,一片古旧的灰色房屋,次第坐落在和平门外风雨剥蚀的古城墙下(因修建地铁,目前这段古城墙已荡然无存)。南面不远,是赫赫有名的琉璃厂文化街。

1963年秋,我来校报到时见到的第一位老师是团委书记。他是留校生,向新同学们介绍学校概况时,提到一长串名单:赵世炎、钱学森、姜泗长、李德伦、于之……一个个都如雷贯耳。正值新生们振聋发聩之际,团委书记充满自豪地补了一句:这些,都是我校的历届高中毕业生……北师大附中的学生都是从各个学校筛选出来的佼佼者,学习空气和政治空气自然都非常浓。我升入高中不久,便写了入党申请书,并开始了关于党章和党的建设理论的学习。记得在我所在的班级里,还出现过这样的学习小组。

不久,党中央书记处指示要在中学生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据说彭真同志还批评对此心存疑虑的某些领导同志:“想想你们是多大人党的?为什么你们可以,现在的青年人就不行呢?”就这样,我和学校里的其他三名同学,得以在1965年12月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在普通中学生中发展党员还是件十分新鲜的事情,也许是为了使更多的师生员工都受些教育,党支部的那次发展大会是在学校大礼堂举行的。这种上千人规模的支部会,在我一生中还是惟一的一次。

时逢岁末,严冬的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寒气袭人。可是,学校简陋的礼堂里,却像俄罗斯作家柯罗连科在小说《盲音乐家》中描述的那样:“春天以双倍的活力闯进房来。含笑的春日向洒满阳光的窗口探望……人们的呼吸也畅快和舒服多了,一切都洋溢着春天的万象更新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力。”鲜红的党旗周围,环绕着刚劲的翠柏、郁郁的青松。下午两点钟,悲壮深沉的《国际歌》声像一阵浩荡的春风,把春天的帷幕进一步拉开了: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这蕴含着雄伟力量的歌声,曾鼓舞多少人怀着对新世界的信念,大踏步地走上敌人的刑场,又曾陪伴多少人从沉沉的暗夜奔向战斗的黎明!以往,我曾经千百次地高唱过这首歌,每一次,都会感到一种强烈的震动。可是,无论哪一次,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让我深刻感受到这首歌内在的力量。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介绍人对缺点的介